doi. 10. 3724/1005-0566. 20260408

五社联动驱动下的城市新居民社会认同生成路径研究：以嘉兴市三个社区为例

刘炳胜，汤汉东，王　丹

（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重庆　400044）

摘　要：在快速城市化与人口流动加速背景下，新居民社会认同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议题。本文以嘉兴市三类社区为案例，运用“情境—主体—行动”框架，揭示五社联动驱动新居民社会认同生成的 3 条路径：数字协同型、组织整合型与自治驱动型。研究表明，路径差异源于制度压力强度与关键主体战略资源差异，并映射出中国情境下合作生产的嵌套结构。

关键词：城乡融合；五社联动；新居民；社会认同

中图分类号：F293. 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 - 0566(2026)04 - 0086 - 12

Pathways of social identity formation among urban new residents driven by the five-society linkage: Evidence from three communities in Jiaxing

LIU Bingsheng, TANG Handong, WANG Dan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rapid urbanization and accelerated population mobility, the social identity of new resident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in grassroots governance. Taking three types of communities in Jiaxing as cases, this study employs the “context-actor-action” framework to identify three pathways through which the Five-Society Linkage facilitates the formation of social identity among new residents: the digital collaborative pathway, the organizational integration pathway, and the self-governance-driven pathway. The findings show that differences among these pathways stem from variations in the intensity of institutional pressures and in the strategic resources possessed by key actors, and reflect the nested structure of co-production in the Chinese context.

Key word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Five-Society Linkage; new residents; social identity

随着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持续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已成为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议题[1-2]。其不仅涉及基础设施与要素资源的空间重构，更伴随着人口迁移、制度嵌入与社会认同的深层变革[3-4]。在这一进程中，外来务工人员、农村转移人口及返乡创业者等新居民逐步成为基层社区的重要社会构成。然而，与其日益增长的数量和社会贡献相比，新居民在社会认同方面依然面临挑战[5]。

现有研究表明，新居民的社会认同建构呈现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项目“基础设施促进城乡融合可持续发展的驱动机理与决策机制研究”（T226112947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三生空间视角下老旧小区改造多主体协同治理机制研究”（72304051）；重庆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可持续发展视角下城市住区更新治理多主体决策机制研究”（25SKJD013）。

作者简介：刘炳胜（1979—），男，天津人，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公共治理、城乡融合、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通信作者：王丹。

双重困境:一方面,在户籍制度、公共资源配置与社区治理实践中,他们往往处于制度边缘,缺乏正式的制度性接纳渠道[6];另一方面,由于社会资本不足,他们在社区互动中难以建立稳固的情感联结与身份认同[7]。制度与情感的双重断裂,构成了城乡融合背景下的一种结构性张力,阻滞了融合发展目标的实现。为回应这一问题,各地在实践中探索多元共治机制,其中五社联动(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志愿者与社区居民协同参与)逐渐成为推动社区协同治理、提升新居民参与度与认同感的重要制度安排[8]。但已有研究与实践表明,五社联动的治理绩效在不同社区呈现差异化,其作用机制尚待深入探讨。从公共管理视角来看,这一过程不仅关乎社区治理的改进,更契合合作生产的核心内涵[9]。合作生产被界定为公共服务用户在服务设计、管理、提供和评价中的参与过程,新居民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正是如此:他们既是公共服务的接受者,也是积极的参与者和生产者[10]。与此同时,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的协同介入,也使五社联动成为合作生产在中国社区治理中的制度化实践[11]。

然而,五社联动并非在所有社区都能奏效。已有研究表明,五社联动在不同社区呈现出差异化的运行机制和成效,有的社区形成了新居民认同的良性循环,有的却停留在形式化和被动应付[12]。由此可知,五社联动并非一个能直接套用的万能工具,而更接近于情境—制度—行动复合体,其作用机制需要置于具体的治理情境中加以考察[13]。因此,本文聚焦以下问题:第一,在不同类型的社区中,五社联动机制如何推动新居民社会认同的形成?第二,社区治理情境、主体资源禀赋与行动逻辑的差异,如何导致认同建构路径的分化?通过探讨上述问题,本文旨在深化城乡融合背景下新居民社会认同建构的理论理解,同时为合作生产理论在中国基层社区的本土化发展与制度适配提供实证回应。

一、文献回顾

新居民社会认同是指新居民在制度承认、社区互动及文化归属等方面获得认同与接纳的过程[14-15]。近年来,随着人口流动规模的不断扩大,学界从不同视角探讨了新居民的社会认同建构路径,主要集中于个体适应视角、制度视角和治理视角3个方面。

个体适应视角注重新居民的文化适应、心理认同与社会资本积累过程[16]。相关研究从迁入者与本地居民之间的互动入手,分析文化差异、情感归属和社会网络如何影响认同建构[17]。一些学者强调,语言习惯、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差异往往导致新居民认同感不足[18]。这一视角突出了微观层面个体经验的重要性,但较少关注制度安排与治理结构的作用。制度视角则强调制度设计在促进或阻碍新居民认同中的作用。户籍制度、公共资源配置、社会保障政策等被视为影响新居民制度性接纳的关键因素[19]。相关研究表明,制度的排斥性设计往往使新居民长期处于社会边缘,难以获得平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待遇[20]。治理视角下,学界更多关注多元主体在社区治理中的互动,以及这些互动如何塑造新居民的社会认同。研究主题包括:社区治理模式[21]、社会组织作用[22]、志愿服务与社会工作介入[23]等。如何在多元主体互动中实现利益平衡、促进公共价值生成,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在此背景下,五社联动逐渐成为学界和政策实践关注的治理机制[25]。已有研究尝试将其作为城乡社区治理的重要创新工具,探讨其在资源整合、服务供给与认同建构中的作用[26]。然而,该机制在不同社区表现出差异化效能,部分社区取得了积极成效,而部分社区却流于形式化。

值得注意的是,学界在分析五社联动时,更多置于协同治理、多元共治的框架下,而较少从合作生产的视角深入探讨。协同治理和多元共治理论强调不同主体的合作关系,但其分析层次偏向组织间互动,对公共服务使用者的参与逻辑关注不足。相比之下,合作生产理论更加强调公共服务使用者在服务供给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强调公民通过资源投入、合作互动和价值共创,在服务中扮演关键角色[27]。已有少量研究开始运用合作生产理论解释社区治理的参与逻辑,但多数停留在学理探讨,缺乏基于具体情境的实证分析[28]。因此,现有研究仍存在两个不足:其一,对新居民认同建构的研究偏重个体适应和制度设计,缺乏揭示用

户参与、互动机制与价值创造的过程性分析;其二,关于五社联动的研究多停留在宏观制度或中观组织层面,缺乏嵌入具体社区情境、探讨其运行逻辑和因果机制的研究。因此,本文将合作生产理论引入到城乡社区治理的分析框架中,通过嘉兴市典型社区的比较案例,深入探讨五社联动在新居民认同建构中的动力机制与路径差异。

二、分析框架与研究设计

(一)情境—主体—行动分析框架

新居民社会认同的生成并非单纯的心理反应或制度结果,而是嵌入于具体治理情境中的多元主体互动过程[29]。这一过程在基层社区尤为显著,既受到制度环境与政策导向的制约,也依赖于关键主体的资源禀赋与行动逻辑。为系统揭示五社联动在新居民认同建构中的作用机制,本文构建了情境—主体—行动的三维分析框架(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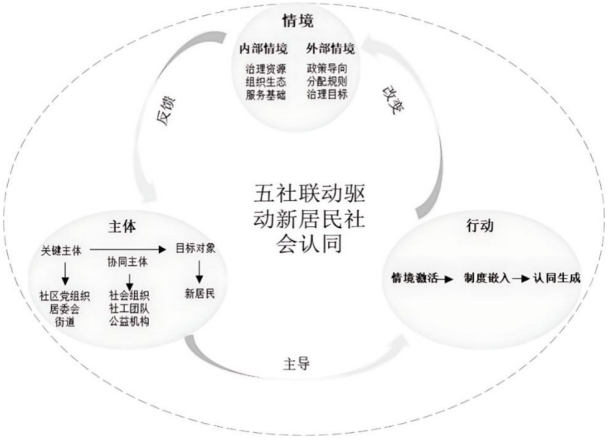


图 1　情境—主体—行动分析框架

首先,情境维度强调制度环境与组织生态的作用。外部情境体现为国家与地方政策导向、治理绩效考核与财政资源配置等制度压力,它决定了社区治理创新的边界与方向;内部情境则表现为社区自身的组织结构、资源基础与居民构成,是新居民能否获得制度接纳与社会互动的起点。

其次,主体维度聚焦于多元治理主体的角色分工与互动逻辑。本文将五社划分为 3 类:关键主体(社区党组织、居委会或村委会等,负责制度设计与统筹推进)、协同主体(社会组织、社工、志愿者、公益机构等,承担服务供给与资源连接功能)与目标对象(新居民,既是治理的受益者,也是通过参与逐步形成认同的行为者)。这种划分有助于揭示治理过程中权威主导与协同合作之间的关系。

再次,行动维度强调认同建构的动态过程。具体包括 3 个阶段:①情境激活—外部制度压力或内部治理困境触发五社联动机制介入;②机制嵌入—多元主体围绕认同目标展开制度设计与协作行动,如组织整合、平台建设、志愿服务等;③认同生成—通过持续互动,新居民在情感归属、制度认可和公共参与方面逐渐实现身份重构与社会认同。

(二)研究设计

为检验上述分析框架并深入探究五社联动驱动新居民社会认同的路径差异,本文采用嵌套式多案例研究方法[30]。研究团队于 2025 年 5 月—7 月在浙江省嘉兴市开展实地调研,选择嘉兴市作为研究场域的主要理由:其一,嘉兴市位于长三角城市群核心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全国中高梯队,兼具产业承载能力与人口吸纳功能,是观察大规模新居民涌入情境下基层治理变革的重要窗口;其二,嘉兴市在数字化改革和基层治理现代化方面具有先行示范优势,如整体智治、未来社区等改革均在全省乃至全国具有引领意义,为五社联动的制度化运作提供了丰富实践;其三,嘉兴市城乡结构多样,城市社区、城郊社区与传统村落并存,使得在同一宏观制度背景下比较不同治理情境具有可行性和典型性。案例选择遵循典型嵌套逻辑,选取北荡社区、西山社区和桃园村 3 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主要基于以下标准[31]:①路径类型差异性,3 个社区在五社联动推动新居民社会认同生成的过程中呈现出显著不同的运行逻辑;②治理情境的基础相似性,3 个社区均面临新居民比例高、治理转型压力大、政策支持较强等共同背景,具备可比性;③路径演化的显著差异性,在认同生成逻辑上各具特色,便于对比分析;④资料的可进入性与完备性,3 个社区均与研究团队保持良好沟通,具备充足的一手与二手资料来源,保证研究的可靠性。三地案例在关键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但均体现出五社联动机制驱动新居民认同的治理逻辑,为路径差异比较与理论机制归纳提供了坚实基础。

为保障研究的信度与效度,本文采取以下措施:其一,通过资料三角验证将访谈、政策文件、社区工作台账和现场观察进行交叉比对;其二,通过研究者三角验证由多名研究者分别对文本进行交叉校验,以提升一致性;其三,通过成员检验向部分受访者验证初步研究发现,以增强材料解释的可信度;其四,通过跨案例对比不断检验理论推导与实地材料之间的匹配程度,从而确保理论结论的稳健性。

三、案例比较:五社联动驱动新居民社会认同构建三类路径

(一)北荡社区:数字协同型路径

1. 治理情境

(1)人口结构剧变带来的内部困境。随着征迁安置与保障性住房政策实施,大量新居民在短期内涌入,使得社区常住人口自 2015 年的 3 200 人上升至 2023 年的 1.1 万人,新居民占比超过 60%。人口结构的骤变打破了原有熟人社会的互动格局,导致公共空间冲突频发、邻里互信缺失、社区事务参与率低下。原有依赖血缘、地缘维系的社会网络逐渐瓦解,新旧居民之间形成明显的社会断裂,社区的认同基础受到严重冲击。

(2)数字化治理考核带来的外部压力。自 2021 年以来,嘉兴市全面推进未来社区建设,将数字治理模块纳入基层治理绩效考核体系。北荡社区被列为街道级试点,必须通过接入“城市大脑—基层治理子系统”来实现诉求收集、议题响应与民意反馈。然而,由于新居民参与意愿不足、线上互动活跃度不高,社区在多轮考核中表现不佳,基层干部普遍承受较大的绩效压力。

在这一双重情境下,北荡社区逐渐将五社联动与数字治理平台结合,探索形成数字协同型路径。如图 2 所示,该路径一方面在外部制度压力推动下强化党建引领与绩效导向,另一方面通过智慧赋能与平台建设整合多元主体(居委会、社会组织、物业公司、社工与志愿者等),试图打破新老居民间的互动断裂,推动公共事务从单兵作战转向多元共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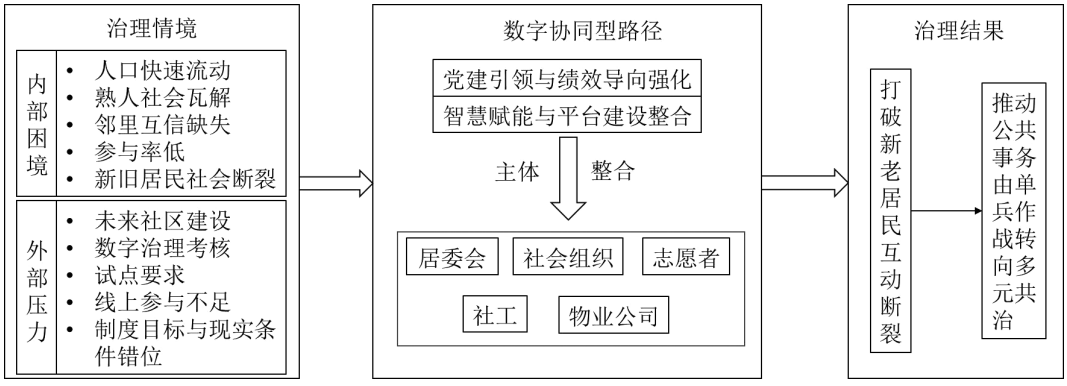


图 2　数字协同路径构建动力机制

2. 数字协同与社会认同构建机制

在双重情境压力下,北荡社区探索形成了数字化 + 联动式的复合治理模式。该模式的核心逻辑在于:以党建引领为主轴,借助数字平台实现资源整合与服务协同,从而推动新居民由被动观察者逐步转变为积极参与者。其运行机制可归纳为以下方面(见图 3)。

(1)双平台驱动的多元联结机制。北荡社区依托线上 + 线下双重平台构建起五社主体协同治理的中枢。线上平台(如盐精灵、微嘉园小程序)降低了居民参与门槛,实现诉求报事、活动报名和积分兑换等功能。正如一位社工所说,“小程序用得多了,居民也习惯在线上点单,我们后台第一时间派单,基本能做到件件有回应”(访谈 ND-SG-202506-01)。线下阵地(如党群服务中心、养老照护中心)则汇聚社会组织、企业公益和志愿团队资源,为居民提供面对面的交互与服务。一位企业志愿者代表提到,“社区的资源整合能力很强,我们愿意参与,也看得到成效”(访谈 ND-QY-202506-01)。通过虚拟—现实的双平台嵌合,社区在制度性参与和功能性融入之间建立了有效的联结通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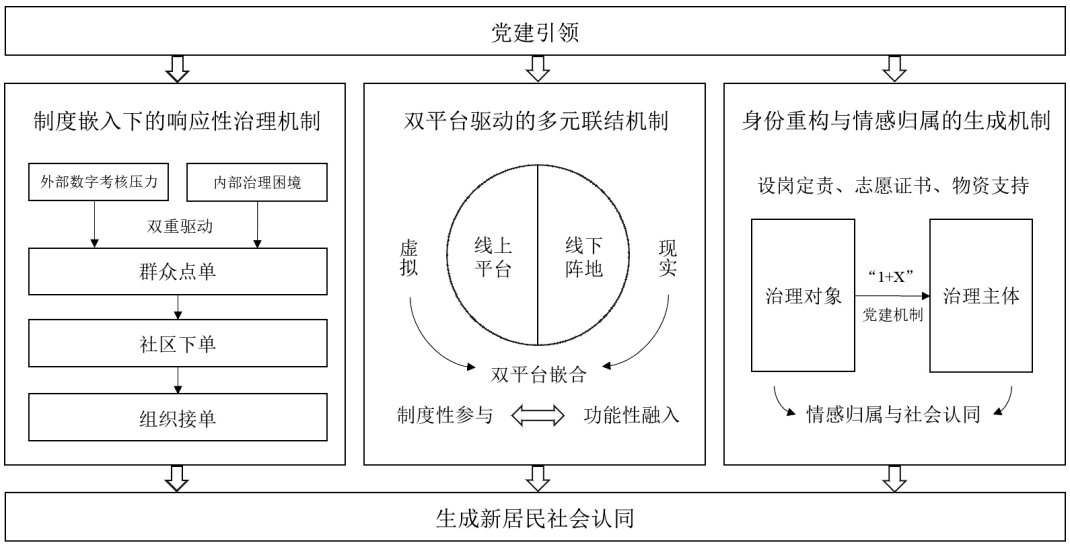


图 3　数字协同型路径运转机制

（2）制度嵌入下的响应性治理机制。在外部数字考核压力与内部治理困境的双重驱动下，北荡社区逐步形成了群众点单—社区下单—组织接单的运行模式。居民在数字平台上提出需求，社区进行统筹分派，社会组织与志愿者则提供相应服务。一位居民在访谈中表示，“以前报修要等一周，现在两天就有人上门了，感觉社区真在听我们的声音”（访谈 ND-JM-202506-01）。这一机制不仅提升了问题解决的效率，更重要的是，它赋予新居民以需求提出者和服务参与者的双重身份，从而在制度化的治理过程中获得参与感与认同感。

（3）身份重构与情感归属的生成机制。借助党建引领，北荡社区通过“1 + X”党建机制将外卖员、快递员等新业态人群纳入社区志愿服务体系，并通过设岗定责、志愿证书与物资支持等方式实现身份转化。一位外卖员在访谈中谈到，“以前总觉得自己只是个路过的，现在社区给我安排岗位、发志愿证，真有点自己人的感觉”（访谈 ND-ZY-202506-01）。这种从治理对象到治理主体的转变，使新居民逐步建立起对社区的情感归属与社会认同。

（二）西山社区：组织整合型路径

1. 治理情境

（1）人口多元化带来的内部困境。西山社区位于海宁市硖石街道，属于典型的城市融合型社区，下辖多个住宅小区与商住混合片区。2023 年西山社区辖区人口 10 480 人，新居民 5 100 人。社区居民构成高度多样化，既包括原有本地居民，也涵盖新购房业主、外来务工人员、返乡创业者及少数民族群体。不同群体在生活习惯、价值观念和参与意愿上差异明显，社区一度呈现出多元共在、相互陌生的格局。访谈中，一位外来居民直言，“我住在这里三年多了，社区搞什么活动我们也不太清楚，微信群都不在，我们这些外来人感觉就像过客”（访谈 WS-XJR-202507-02）。这种认同断裂导致公共服务供需错配，社区事务参与率偏低，治理活力不足。

（2）行政惯性带来的组织困境。面对多元化需求，原有居委会的组织架构和服务能力难以满足精准化、持续性的治理要求。一些基层干部表现出维稳型治理倾向，更多是按部就班、不出事，而缺乏主动创新。正如一位社区干部所言，“我们人手有限，任务重，很多时候就是把上面的要求落实到位，能不出错就行了”（访谈 WS-CB-202507-01）。这种行政惯性使得社区陷入服务分化—参与断裂—组织疲软的循环困境。

（3）政策导向带来的外部压力与转折。西山社区的治理僵局开始在被纳入嘉兴市新时代基层治理试点后迎来转机。随着共同富裕战略的推进，市委、市政府明确提出要推动社区治理现代化，要求强化社会组织、志愿服务与慈善资源的引

入与协同。社区党委在街道领导的推动下意识到,单靠行政资源已难以应对复杂问题,必须转向社会化、平台化的治理模式。一位干部强调,“我们不能再等上面给答案了,要主动找人、找资源、建平台。‘爱心联盟’就是我们对社会力量的内联外引”(访谈 *WS-CB*-202506-02)。在这一制度激励与政策导向下,西山社区逐步走向组织重构,形成以党建引领为核心、以社会组织枢纽平台为支点的治理新格局(见图4)。

2. 组织整合与社会认同构建机制

在政策导向和社区转型的双重背景下,西山社区逐步形成以爱心联盟为核心的组织整合型治理路径(见图5)。该路径的关键在于:通过党建引领与平台化治理,将分散的社会力量纳入统一框架,实现公共服务的协同供给与新居民认同的重塑。其运转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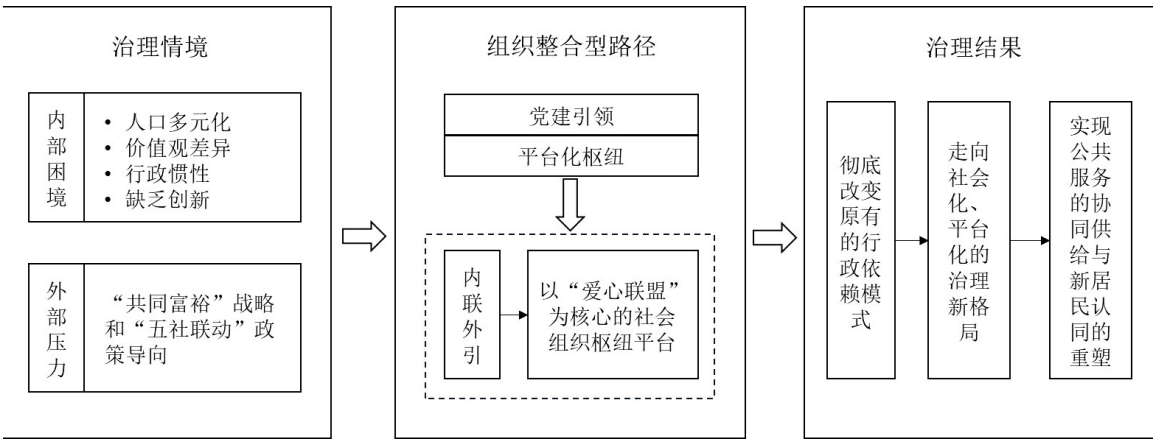


图4　组织整合型路径构建动力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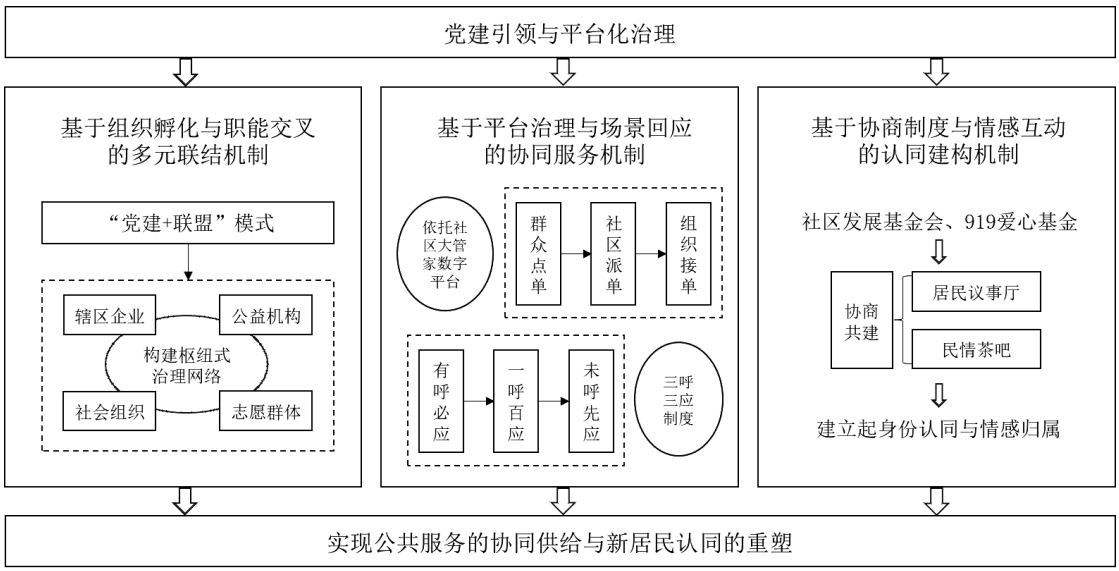


图5　组织整合型路径运转机制

(1)基于组织孵化与职能交叉的多元联结机制。西山社区通过党建+联盟模式整合辖区企业、公益机构、社会组织和志愿群体,构建起枢纽式治理网络。截至调研期,爱心联盟吸纳147家成员单位,并在此基础上孵化出43家功能性社会组织。正如一位社工负责人所言,“我们社工既是执行者也是发起人,一人多岗才能把志愿和服务体系串起来”(访谈 WS-SG-202506-01)。社区干部也强调,“以前各做各的,现在通过联盟有了总调度,能把不同力量拧成一股绳”(访谈 WS-CB-202506-03)。这种组织交叉与职能互嵌,不仅提升了资源整合力,也为新居民提供了更多正式参与的通道。

(2)基于平台治理与场景回应的协同服务机制。依托社区大管家数字平台,西山社区建立起群众点单—社区派单—组织接单的闭环服务机制,形成精准化、场景化的服务供给。一位青年家长表示,“我们上班忙,社区能根据我们需求配托班,实在是解决了大问题”(访谈 WS-JM-202507-01)。同时,社区还通过“有呼必应、一呼百应、未呼先应”的三呼三应制度,将居民的潜在需求前置化,主动推动公共服务嵌入日常生活。正如一位外来居民感叹,“有时候服务还没来得及想,就已经送到门口了”(访谈 WS-XJR-202507-02)。这一机制显著提升了居民的参与感与信任感,推动治理从被动响应走向主动识别。

(3)基于协商制度与情感互动的认同建构机制。西山社区常态化运行居民议事厅、民情茶吧等多元协商平台,将新居民代表制度性纳入议题讨论与决策环节。一位新居民志愿者提到,“在这里干了两年志愿服务,我早就把这里当成家了”(访谈 WS-ZY-202506-01)。通过议题共商与项目共建,新居民逐步从旁观者转变为行动者,在互动中生成身份认同与情感归属。同时,社区发展基金会和 919 爱心基金为项目运营提供稳定的财政保障,使认同建构不仅停留在象征性参与层面,而是能够通过持续性实践获得强化。

(三)桃园村:自治驱动型路径

1. 治理情境

(1)人口多元化带来的内部困境。随着三峡库区移民、返乡创业人员及城市溢出人口的持续进入,桃园村从原本的传统农业村落转型为人口多样化的社区,2023 年桃园村新居民占比 20% 左右。新老居民在生活习惯、利益诉求和交往方式上差异明显,造成社会关系疏离。正如一位原住村民所说,“以前大家都熟,哪家有事一喊就来;现在人多了,谁是谁都搞不清楚”(访谈 THC-XY-202506-01)。新居民则普遍反映缺乏制度化的参与通道,“感觉村里的事情都是老村民在决定,我们外来人就是租住者”(访谈 THC-XJR-202506-01)。这种互动断裂导致社区内部出现了表面平稳、实则隔阂的结构性困境。

(2)传统治理模式的适应性不足。桃园村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依赖村干部加村民代表的传统动员模式,这种治理方式虽然能够维持基本秩序,但难以回应新居民多样化的公共服务需求。尤其是在公共空间使用、子女入学和环境卫生等议题上,新旧居民之间摩擦频发,却缺乏有效的制度化协调机制。一位村干部坦言,“过去靠村干部说一声就行,但现在新居民越来越多,靠人情已经管不住了”(访谈 THC-CB-202506-01)。传统治理惯性与人口结构多元化之间的不匹配,使治理陷入低效与失灵的风险。

(3)城乡融合与政策试点带来的外部压力与契机。在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政策的推动下,桃园村被确定为基层治理创新试点。镇党委和上级政府明确要求探索差异化的治理路径,推动移民群体的有效融入。正如村党支书记所强调,“如果还是用老办法,新居民永远融不进来,我们必须建新机制,让大家都有发声和参与的机会”(访谈 *THC-CB-202507-02*)。在这一制度压力与政策激励的双重作用下,桃园村逐渐启动治理结构转型,探索以微组织为支点的自治驱动型路径,推动新旧居民在日常互动与共同治理中实现逐步融合(见图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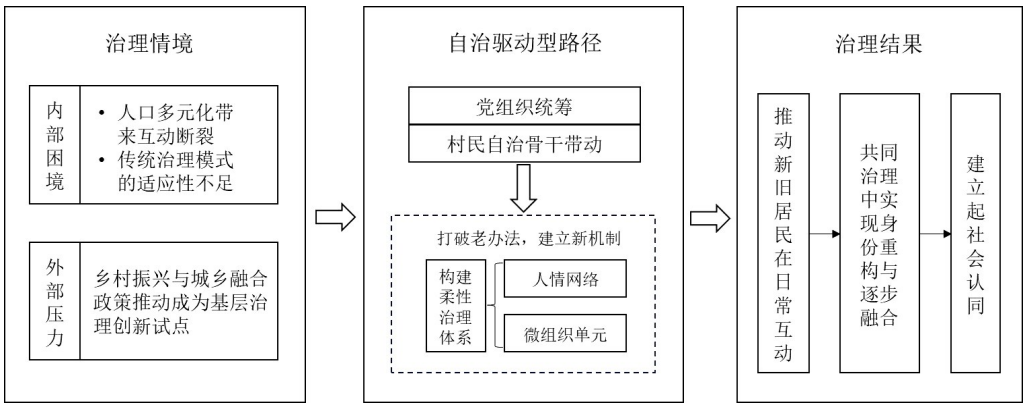


图 6　自治驱动型路径构建动力机制

2. 自治驱动与社会认同构建机制

在城乡融合与人口多元化的背景下，桃园村逐渐探索出以微组织为核心的自治驱动型治理路径。该路径的核心逻辑在于：通过党组织统筹和村民自治骨干带动，构建起基于人情网络和微组织单元的柔性治理体系，从而推动新居民在日常交往与共同事务中逐步实现认同（见图 7）。其运转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 3 个方面。

（1）基于村民骨干与微组织的内生性联结机制。桃园村依托老党员、乡贤和德高望重的村民，组建自治急先锋、议事参议员等功能性微组织，形成日常事务的快速响应机制。与此同时，村委会建立人才库，根据居民特长组建维修组、文艺宣传组、农业服务组等志愿小组，激活本地社会资本。新居民在参与过程中逐渐完成身份重构。一位江西来的新居民提到，“起初只觉得自己是外来人，但参加村里义诊活动后，慢慢熟悉了大家，也被请进了文艺小组”（访谈 THC-XJR-202506-02）。这种内生性的联结方式，使新居民能够通过参与具体事务融入社区网络。

（2）基于“微单元—全议题”的协商治理机制。桃园村在党群服务中心与文化礼堂设立睦邻议事厅、村民议事会、乡贤参事会等多层次议事平台，推动公共事务的协商共治。新居民代表被制度性地吸纳进议事平台，逐渐获得正式的发声权。一位新居民代表表示，“以前听都不让听，现在会上能提意见、说诉求，觉得真是我们村的一员了”（访谈 THC-XJR-202506-04）。此外，村里上线睦邻微客厅数字平台，突破空间限制，便利外出务工群体参与村务讨论和服务反馈。据统计，自平台运行以来，近三成议题由新居民主动发起或参与。由此，村庄实现了从干部定到共商议的治理转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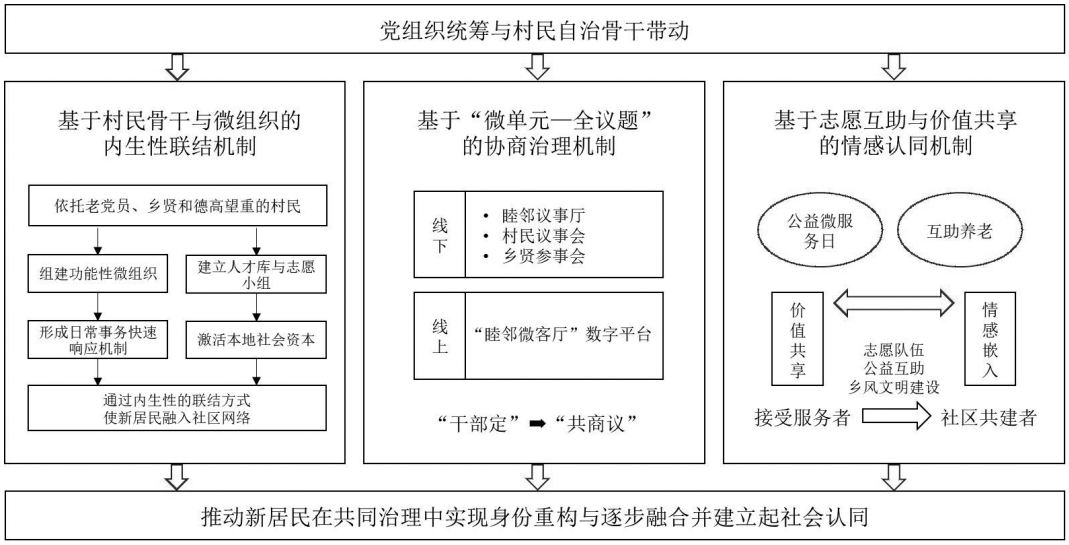


图 7　自治驱动型路径运转机制

（3）基于志愿互助与价值共享的情感认同机制。桃园村通过公益微服务日、互助养老等项目，将新老居民共同卷入邻里互助和公共服务中。村里一位独居老人感慨，“不用搬去镇上，村里就能安度晚年，这里已经是我的家”（访谈 THC-JM-202506-01）。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新居民不再只是被动接受服务的对象，而是通过志愿队伍、公益互助和乡风文明建设成为社区的共同建设者。一位长期参与志愿服务的新居民表示，“现在村里大小事务我们都能插上手，慢慢有了主人翁的感觉”（访谈 THC-ZY-202506-01）。这种价值共享与情感嵌入机制，推动了新居民从外来者到社区成员的身份转变。

五、理论解释：制度压力与关键主体的战略资源共同构建五社联动驱动新居民社会认同路径差异

（一）五社联动驱动新居民社会认同路径差异的动力机制

通过对北荡社区、西山社区与桃园村 3 个案例的比较，可以发现五社联动在不同社区中呈现出

差异化的认同建构路径，其背后主要源于两类动力机制的作用：一是外部制度压力的传导逻辑，二是社区关键主体所掌握的战略性资源。相较于将情境、主体与行动简单视为三层并列要素，它们更应被理解为一个相互嵌套、循环作用的动态系统：特定情境不仅规定了行动的可能空间，也通过考核指标、政策话语等方式塑造了关键主体对问题的界定与策略选择；同时，不同主体基于各自资源禀赋所作出的行动，又会反过来重塑制度情境，例如改变上级部门对社区治理绩效的评价、影响资源后续投放方向，从而形成情境—主体—行动—再情境的循环过程。

1. 制度压力传导机制：外部驱动的差异化响应

制度压力构成了五社联动运行的外部推力，其表现形式包括政策考核、示范试点与资源倾斜等[32]。在不同社区，制度压力的强度和形式直接塑造了联动路径的选择。

在北荡社区，作为未来社区数字治理试点，社区党组织必须落实数字平台建设与绩效考核要求。这种硬约束型制度压力迫使社区优先采用数字协同型路径，强调技术赋能与制度性参与。在这一过程中，情境中的绩效指标被基层干部和运营团队重新解读为可管理的技术任务，从而引导其通过平台设计和任务拆分，把原本抽象的考核压力转化为居民在线报事、志愿积分等具体行动场景。

西山社区则处于制度激励与自主探索并存的情境。海宁市被赋予打造基层治理的任务，市委市政府推动社会组织、志愿服务等力量深度嵌入。这种制度激励型压力引导社区党委在政策支持下整合资源，形成组织整合型路径。试点与评优的情境并没有以刚性指标直接约束社区，而是为基层提供了制度机会结构：社区党委基于自身对机遇与风险的判断，主动选择以爱心联盟为抓手扩展社会组织网络；随之而来的项目落地、基金运作和媒体曝光，使组织整合型路径逐渐由个别实践上升为制度化安排。

相比之下，桃园村未被纳入严格的考核体系，但在乡村振兴与移民安置政策的引导下，仍面临改善治理、促进新居民融入的外部期望。这种柔性引导型制度压力为社区提供了自主调整空间，使其依托乡贤网络和微组织力量形成自治驱动型路径。此制度情境更像是一种原则性期待而非可量化约束，村党总支和乡贤骨干据此发展出以微组织、议事会为核心的自治实践；自治实践产生的秩序改善、矛盾化解和认同提升，又被上级总结为经验案例在镇域层面推广，进一步反向塑造了对自治驱动路径的政策认可。

可见，制度压力的差异化传导导致了路径分化。北荡社区以政策合规为核心、重视技术工具，西山社区在制度激励下注重组织整合与制度创新，桃园村则在柔性政策空间中强化自治与人情网络。更为关键的是，制度压力并非单向自上而下的硬推力，而是通过基层主体的选择性解读与策略性回应，在不同社区被翻译为截然不同的治理路径，并在实践成效的反馈中不断被修正和再生产。

2. 战略资源禀赋差异：关键主体的路径塑造能力

除了外部制度环境，不同社区的路径选择还取决于关键主体所掌握的战略资源，包括组织网络、人力资本、技术能力与社会资本等[33]。

北荡社区的关键资源在于数字技术与政企协作能力。社区党组织与外部运营团队熟悉平台运作和绩效考核逻辑，并获得专项资金支持，因此更倾向于通过数字协同型路径推动新居民融入。在西山社区，成熟的社会组织基础与丰富的志愿者资源是其显著优势。社区党委与爱心联盟平台具备较强的组织动员与项目孵化能力，使其能够形成组织整合型路径。桃园村的优势则在于乡贤与村民骨干所形成的社会资本。尽管缺乏专业社工与外部社会组织，但依靠强大的熟人网络和乡贤资源，村党总支能够激活自治微组织，推动居民自发参与。

因此，社区所拥有的战略性资源决定了其在五社联动中的主导逻辑：西山依靠组织网络实现制度化协同，北荡依靠数字能力实现政企合作，桃园村依靠人情网络实现自治驱动。从互动视角来看，资源禀赋不仅影响治理主体如何行动，也深刻

塑造了目标对象如何理解与回应情境。在北荡社区,技术公司与社区干部将考核压力理解为数字治理的试验场,新居民则在平台化治理环境中逐步形成策略性参与取向—部分新居民通过线上议事、积分激励与数据反馈等方式主动嵌入治理流程,将数字平台视为获取公共资源与表达诉求的重要工具。在西山社区,社会组织与志愿者网络的成熟,使社区更容易将政策试点视为组织成长与品牌塑造的机会,新居民则通过参与组织化活动、志愿服务与议题协商,实现从服务对象向共建参与者的角色转化,其认同更多建立在组织归属与参与绩效之上。在桃园村,乡贤与熟人网络的长期积累,使基层治理更倾向通过人情调解与微组织运作回应上级治理期待,新居民则通过主动嵌入礼俗关系、参与公共事务与日常互助,在情感互动中逐步完成身份嵌入与认同内化。随着行动不断推进,技术平台、组织联盟网络与自治微组织不仅作为工具性载体发挥作用,同时也被新居民持续策略性使用,并逐步转化为新的制度性资源,最终被纳入地方治理的正式话语与政策设计之中。

(二)理论对话:中国情景下的合作生产模式

合作生产理论最初旨在突破传统公共服务政府独供—公民被动接受的二元范式,强调政府、社会组织与公民在服务供给中的共同责任与价值共创[34]。该理论强调"制度安排—用户参与—价值生成"的互动逻辑,在西方社会主要植根于市民社会传统和权利导向的治理结构。然而,将这一理论直接套用于中国基层治理容易忽视本土制度环境与文化结构的特殊性[35]。

通过嘉兴市北荡、西山和桃园村的对比研究可以发现,中国情境下的合作生产展现出与经典理论既相契合又有差异的特征。北荡社区体现的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合作生产。在强制度约束与数字绩效考核压力下,街道与社区党组织仍然是治理的核心力量。居民更多以信息提供者和任务协作者的身份嵌入治理流程,参与形式具有明显的程序化和制度化特征。这种模式符合合作生产中自上而下嵌入公民参与的逻辑,但公民自主性有限,显示出政府主导与技术赋能下的中国式合作生产。西山社区呈现的是组织整合型的合作生产。依托爱心联盟枢纽平台,西山社区党委通过制度化机制将社会组织、企业、志愿者纳入协同网络,形成多元共治格局。居民则通过议事厅、志愿服务、公益基金等渠道持续参与,身份从受益者逐渐转向共建者。这一模式体现出合作生产理论中的嵌入式元治理特征,即政府提供制度平台,社会组织与居民共同创造公共价值。桃园村展现的是自治驱动型的合作生产。在柔性政策环境下,村党总支与乡贤骨干依托人情网络和微组织推动新老居民共治。居民通过议事会、互助养老和公益服务等形式自主提出议题、协商方案并实施行动。这种自下而上的参与模式与合作生产理论中的社区自我驱动类型高度契合,但又融入了乡土社会的情感网络和制度支持,展现出明显的本土化特征。

若从情境—主体—行动互动视角回看三类合作生产路径,可以发现:政府主导型合作生产中,强制度情境通过考核与技术话语塑造了居民和社会组织的合规性参与;组织整合型合作生产中,试点与联盟制度为社会组织与居民提供了重新定义公共问题、共商解决方案的空间,使其能够在行动中不断拓展制度边界;自治驱动型合作生产,则是在较为宽松的制度情境中,由乡贤和村民骨干通过微观实践一点点累积起新的行为规范与价值共识,进而倒逼上级政策对自治经验作出正向回应。三类路径共同说明,中国情境下的合作生产不是简单的制度输入或自发参与,而是情境、主体与行动在长期互动中彼此塑形的结果。综合来看,中国情境下的合作生产路径呈现出政府主导型、组织整合型与自治驱动型三种模式。与西方以市民自主为核心的合作生产不同,中国模式更强调政府引导与制度嵌入,公民参与往往嵌套在党建引领+制度框架之中;更注重组织协同与平台化,社会组织和枢纽平台在公共服务中的作用突出,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重要桥梁;也更依赖情感网络与文化嵌入,尤其是在乡村社区,合作生产往往通过乡贤网络与邻里互助实现。因此,中国式合作生产并非对西方理论的简单复制,而是形成了一种强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协同、社区嵌入式参与的

多重结构。这一结构既回应了基层治理对效率与稳定的需求，也通过多样化的路径激发了新居民的身份认同与社区归属。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结论

本文以嘉兴市北荡社区、西山社区和桃园村为案例，从制度压力—资源禀赋—治理情境视角剖析了五社联动在新居民社会认同建构中的实际运行机制。研究发现，不同社区在制度压力、资源禀赋和治理情境方面的差异，塑造了三类典型社会认同构建路径：其一，数字考核驱动下的数字协同型，以政府平台和技术工具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其二，社会组织生态成熟背景下的组织整合型，依托枢纽社会组织形成合作网络；其三，乡土社会资本支撑下的自治驱动型，通过柔性制度和人情网络激活社区内生力量。三种路径共同说明，五社联动并非统一且可复制的制度模板，而是一个因地制宜、嵌入式的动态过程。

（二）政策启示

在城乡融合加速推进与人口流动持续深化的新时代，以五社联动促进新居民社会认同生成、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其本质在于通过制度创新、组织协同与情感嵌入，推动新居民由基层治理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参与者和共同建构者。新居民社会认同并非单纯依靠公共服务供给即可自然生成，而是在特定治理情境下，由社区党组织、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志愿者与社区居民共同作用形成的动态结果。因此，五社联动虽然体现为基层治理中的协同机制，但其运作方式、资源配置方式与参与规则，都会直接影响新居民认同建构的深度与持续性，微观层面的互动效果也会进一步累积为基层治理层面的普遍效应。因此，要增强五社联动促进新居民社会认同的能力，必须协同推进微观层面的参与规范性与宏观层面的制度赋能性。

首先，加快建立一套具有分类施策导向的五社联动政策工具箱。政府应充分发挥制度供给和资源整合功能，建立与不同社区情境相匹配的支持机制。在具体措施上，一方面，应根据社区人口结构、组织生态、数字基础与社会关系特征，形成分层分类的治理指引，避免将五社联动简单处理为统一化、标准化的行政模板；另一方面，应将新居民参与程度、协商嵌入水平与认同生成效果纳入基层治理评价体系，以制度化方式引导社区将工作重点从事务完成转向关系建构与认同培育。以制度化、精细化的政策设计塑造五社联动的中国实践模式，不仅有助于增强基层治理效能，也有助于推动新居民更深层次融入社区共同体。

其次，构建具有情境适配能力的新居民融入支持体系。对于数字基础较好、制度压力较强的城市社区，应强化数字平台的人际联结和互动功能，避免平台沦为单纯的事务派发工具；对于社会组织较为发育、服务需求较为多元的融合型社区，应着力培育枢纽型社会组织和专业社工力量，提升社会资源整合与公共服务协同供给能力；对于乡土社会资本较强、熟人网络仍具作用的村社空间，则应重视乡贤、微组织和议事平台的培育，引导柔性自治资源与正式制度安排形成有效衔接。充分发挥不同治理要素之间的协同整合功能，促进制度资源、组织资源与情感资源的深度耦合，能够进一步放大五社联动在新居民认同建构中的作用空间，提升城乡融合背景下基层社会治理的整体效能。

最后，开展面向社区干部、社会组织骨干与新居民群体的认同培育与参与能力建设。鉴于新居民社会认同的生成不仅依赖制度吸纳，也依赖参与意愿、公共精神与情感归属的持续积累，应该通过培训、宣传和实践活动，有组织地提升社区干部的协同治理能力、社会组织和社工的专业服务能力，以及新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与信心；通过政策倡导和社区文化营造，在基层社会中形成尊重新居民、吸纳新居民、服务新居民的良好氛围，推动更多新居民在参与中建立责任意识、在互动中形成归属感、在共建中强化身份认同。只有将制度引导、组织协同与价值塑造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将五社联动转化为促进新居民社会融入和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长效机制。

参考文献：

[1] 文宏，林彬．合规性确认：基层政府突破性创新的纵向协同机制：对 A 区创建城乡融合实验区的考察[J]．公共管

理学报,2023,20(2):1-11,164.
[2] 李春根,罗家为. 从动员到统合:中国共产党百年基层治理的回顾与前瞻[J]. 管理世界,2021,37(10):13-26.
[3]李宏,唐新. 城乡融合发展与农业产业韧性的多维测度与影响机制分析[J]. 农业经济问题,2025(6):66-81.
[4]张红宇. 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透视与实践绩效[J]. 改革,2025(5):1-12.
[5]于海燕. 四维协同取向下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研究[J]. 理论与改革,2015(3):66-69.
[6]江立华,谷玉良."混合社区"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基于湖北省两个混合社区的比较研究[J]. 学习与实践,2013(11):96-102.
[7]林聚任,马光川."城市新居民"市民化与"制度阀"效应:一个制度分析的视角[J]. 人文杂志,2015(1):98-104.
[8]张大维,赵益晨,马致远. 协商式嵌合:结构—行动框架下五社联动的交互逻辑:趋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多案例比较[J]. 中国农村研究,2023(1):3-20.
[9] 王法硕,张桓朋. 敏捷调适:数字化平台何以赋能共同生产:基于K市"监督一点通"平台的案例研究[J]. 公共管理学报,2025,22(3):117-131,173.
[10]于海燕,黄文义. 社会融合视域下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有效性研究[J]. 广东社会科学,2016(6):196-205.
[11]何荣山,李婧煜. 共同体视域下五社联动构建韧性社区治理现代化体系研究[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30(6):286-300.
[12]徐家良,成丽姣."服务激活社会":五社联动驱动社会建设的运行模式[J]. 治理研究,2023,39(2):33-45,157-158.
[13]牛强,盛嘉菲,刘晓阳,等. 武汉市商业和公共服务设施对居民迁居的空间异质性影响[J]. 地理科学,2023,43(5):860-868.
[14]刘雨婷. 隐晦区分:大都市本地居民地域身份认同的重构[J]. 社会发展研究,2021,8(2):222-241,246.
[15]许海平,张雨雪,傅国华. 绝对收入、社会阶层认同与农村居民幸福感:基于CGSS的微观经验证据[J]. 农业技术经济,2020(11):56-71.
[16]于海燕,黄文义. 社会融合视域下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有效性研究[J]. 广东社会科学,2016(6):196-205.
[17]付明辉,刘传江. 社会网络、数字经济与农业转移人口高质量充分就业[J]. 劳动经济研究,2025,13(1):131-159.
[18]颜玉凡,叶南客. 认同与参与:城市居民的社区公共文化生活逻辑研究[J]. 社会学研究,2019,34(2):147-170,245.
[19]程威特,吴海涛,周子铭. 何以为家:农民工身份认同与落户意愿[J]. 农村经济,2021(4):9-17.
[20]管智超,宋志峰. 进城农民市民化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基于户籍身份与心理认同比较分析[J]. 价格理论与实践,2023(1):56-60.
[21]陈云松,张翼. 城镇化的不平等效应与社会融合[J]. 中国社会科学,2015(6):78-95,206-207.
[22]赵迎军. 从身份漂移到市民定位:农民工城市身份认同研究[J]. 浙江社会科学,2018(4):93-102,158-159.
[23]吴业苗."人的城镇化"困境与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J]. 社会科学,2017(1):72-81.
[24]邓大松,胡宏伟. 流动、剥夺、排斥与融合:社会融合与保障权获得[J]. 中国人口科学,2007(6):14-24+95.
[25]卓彩琴,马林芳,方洁虹,等. 从单一主体到五社联动:社会工作者推动农村社区治理结构优化的行动研究[J]. 社会工作,2022(2):46-63,107-109.
[26]徐选国,杨璠. 从关系取向到生态取向:社会工作介入社会治理的逻辑转换及其内在机理[J]. 学海,2025(3):145-155.
[27]蔡晶晶,王亚华. 社会组织激活乡村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的制度逻辑:以四川某NGO为例[J].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5,14(4):32-47.
[28]宋辉,张梦康. 转型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转译":逻辑与进路:基于重庆市3个转型社区的案例分析[J]. 求实,2025(2):54-67,111.
[29] ELLEMERS N, SPEARS R, DOOSJE B. Self and social identity [J].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02, 53(1): 161-186.
[30]谭智佳,张启路,朱武祥,等. 从金融向实体:流动性风险的微观传染机制与防范手段:基于中小企业融资担保行业的多案例研究[J]. 管理世界,2022,38(3):35-59.
[31]范嶙杰,陈永洲. 多重制度压力、全过程监管与安全生产治理绩效提升:基于"制度—行为"框架的增长型QCA分析[J]. 中国行政管理,2025,41(2):120-132.
[32]邢磊. 社会组织何以重塑基层社区集体行动:基于"文化场域"的个案分析[J]. 求实,2025(4):73-85,111.
[33] OSTROM E, PARKS R B, WHITAKER G P, et al. The public service production process: a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police services [J]. Policy studies journal, 1978, 7(1): 381-389.
[34]翁列恩. 中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论框架与实现路径[J]. 中国社会科学,2025(5):54-71,205.
[35]王学军. 专栏导语:从行为视角深化中国情境下的合作生产研究[J]. 公共行政评论,2023,16(2):1-3.